

# 中国 社会史

Le monde chinois

[法] 谢和耐 著  
耿昇 译  
Jacques Gernet  
Gengsheng

中国藏学出版社

*Le monde chinois*  
**中国社会史**

[法] 谢和耐 ◎ 著 Jacques Gernet      耿昇 ◎ 译 Gengsheng

JACQUES GERNET

Professeur au Collège de France Membre de l'Institut

# LE MONDE CHINOIS

Troisièm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ARMAND COLIN  
19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史/谢和耐著;耿昇译.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ISBN 7-80057-555-1

I 中... II. ①谢...②耿 III. 社会发展史—中国—法文 IV. 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674 号

## 中国社会史

---

作 者 [法]谢和耐

译 者 耿昇

责任编辑 冯良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北京北四环东路 13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世纪品峰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第一版 2006 年第一次印刷

开 本 640×965 毫米 1/16

印 张 51

字 数 523 千字

书 号 ISBN 7-80057-555-1/Z·395

定 价 69.00 元

---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zzcb.com.c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讲座与谢和耐教授的《中国社会史》

(代序)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教学与科研机构。它地位极高,所有执教教授都要由全国教授委员会推选,由总统任命。执教教授水平高,地位显赫,所讲授的都是各学科最前沿的学问和最新的科学成果。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设立“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这是西方设立的第一个汉语教学与汉学科研机构,也是中国语言和文学首次进入西方大学殿堂。而俄国于1851年,荷兰于1875年,英国于1876年,德国于1912年才在大学里首开汉语教学课程。更加可贵的是,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何种事件,甚至战争、冷战、经济危机都未使之中断。该讲座的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在国外的汉语汉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也是一枝独秀,别无他例。

### 一、法兰西学院筹建的原因与背景

法兰西学院的创立起始于1530年法兰西斯一世(François I<sup>er</sup>, 1494~1547年)设立的“皇家教授团”(Lecteurs Royaux)。当时巴黎大学垄断了其所辖范围内的全部教育权。它执著于自己的传统,就如同坚守自己的特权一般,拒绝创新。巴黎大学只设有四个系:神学、法学、医学和艺术。但它却声称自己已经涵盖了所有有益而又合法的知识与学问。拉丁语是当时使用的惟一语言。除了医学之外,真正的科学都被简化为中世纪的“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巴黎大学占支配统治地位的是迂腐学究们的狭

隘思想。巴黎的高校是大辩论的中心。在那里的辩论激烈,而学生们的所学却甚少。这种独占而又封闭的机构,似乎很难自我改造。此外,不但大多数东方语言与学术,就连希伯莱学和犹太学、闪学、亚述学等,在那里也同样遭禁。

但就在当时,一种全新的思想,即文艺复兴的思想,却传遍了整个欧洲。诸多先驱们都极力使世人觉悟到,因印刷术的发明而广泛传播的古代的文化积淀,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思想财富。世人都在反省对它们所知甚少,或当时既需要拥有能诠释这些古代财富的教授,也需要有一个高级教育机构,来承担巴黎大学无法胜任的教学任务,特别是当时在法国大学中根本不讲授的希伯莱文与希腊文等知识。16世纪欧洲最伟大的语言教育学家、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年),曾奠定了对过去进行历史性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他既反驳宗教改革家路德的预定论教义,又否认教皇要求获取的权利,在确立欧洲文化的自由传统中起了巨大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一名慷慨地赞助文学教育事业的弗拉芒人哲罗姆·布什莱登(Jérôme Busleiden)于1518年在鲁汶(Louvain)创建了一所“三语学院”,从事翻译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莱文文献,从而激起了那些僵化传统卫道士们的极大愤慨。但当时的巴黎大学却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

在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时代,人文主义学者——皇家图书馆馆长比代(Guillaume Budé, 1467~1540年)特别注重于研究希腊文并极力鼓吹复兴古典研究。他向法兰西一世国王进谏,要求加强研究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莱文。国王于1530年根据其王权的管辖范围,组建了“皇家六教授团”,其中有三名希伯莱文、两名拉丁文和一名数学教授。这就是法兰西学院的雏形,成了法国一个高等学术研究核心,其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古典语言文学的兴趣和研究。该学院的东方语言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限于希伯莱文和阿拉伯文。

法兰西学院组成之后,新教授们的授课课程吸引了许多层次不同的听众。这对于那些刻板教条的教育,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击。听众们通过各种语言研究,追溯到不同文明的起源。从而促使了那些自由宽松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不断地迸发出来。

雏形时的法兰西学院,只隶属于国王,从而使之摆脱了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大学行业章程强加给大学教授们的思想与行为羁绊,与传统和陈规陋习分道扬镳。皇家教授团在整个15世纪期间,聚集了法国科学界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但当时法兰西学院却既没有自己的固定校舍,甚至也未形成一个单独的法人教育机构。由于它没有法人代表,故只被置于国王最高权力的保护之下,英雄尚无充分的用武之地。法兰西学院的兴旺发达,只能取决于其教授们个人的才华与影响。这些教授们有的擅长于考据和出版文献,其他人则讲解古典时代的演说家、哲学家、史学家或诗人们的著作。所有人都是启蒙大师或学者。

法兰西学院这个皇家机构的良好名声,一直持续到17和18世纪。当时,该学院的组织明朗化,讲座的数目也大增。在旧制度(法国1789年之前的王朝)末期,讲座已骤增到二十多个了。自17世纪以来,皇家教授团才真正形成一个机构,它有了自己的课程表与可供张贴的海报,并且有了一个正式名称“高卢皇家学院”。1610年,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年)制定的为该学院营造固定校舍的计划,终于开始实施。年仅九岁的路易十三为校舍奠基。直到18世纪末,才依照经修改的建筑设计图,由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建筑师——巴黎凯旋门的设计人沙尔格兰(Jean-François-Thérèse Chalgrin,1739~1811年)建成,选址于康布雷(Cambrai)广场,直属负责王宫事务的国务卿管辖。

1772年,法国国王决定彻底改组法兰西学院讲座教席的分配,将创新课程纳入其中,有牛顿物理学、突厥语和波斯语、国际法与本国法、机械学、法国文学、历史、自然史、化学,再加上先前已存在的医学、解剖学、阿拉伯语、希腊哲学、希腊语言、拉丁文、拉丁诗

歌、教会法、希伯来语、数学等学科,其施教科目已经蔚为壮观了。

法兰西学院徽章上的名言是“普教一切”。由于它向世界的开放性及其观念的创新性,从而使它成为旧制度下所有机构中,惟一逃脱了大革命动乱的冲击者。尽管其多项改革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但它无论是在帝国时代,还是此后,都享有越来越大的教学与科研自由。1802年花月(floréal,法兰西共和历第8月,公元4月20~21日至5月19~20日)11日(5月1日)的法令,实际上赋予了它提名教授候选人的自由,这就是该院现行制度的源头。其灵活的组织,使它可以毫无困难地适应变化的观念并能随时取得发展。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外界的变化,它也发生了某些变迁。时至今日,法兰西学院仍在开辟和发展新的研究方向,依然执著于自己的优良传统。

## 二、法兰西学院于西方首开设立 中国语言文学讲座之先河

法兰西学院主持阿拉伯讲座的教授希尔维斯特·德·萨西(Sylvestre de Sacy, 1758~1838年)是当时法国东方学界的领军人物。自1776年开始出版发行的《中国杂纂》的第17卷,正是在他的呼吁、奔走和具体安排下,才于1814年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艰难问世。当他在法国政府黄经局任职时,曾收到过人华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年)从中国寄回的两部手稿:一部是发寄于1753年5月的《中国唐代历史纲要》,另一部是于1749年9月27日寄出的《中国纪年志》。这两部著作是有关中国历史纪年和天文学史的重要论著。当时法国的黄经局局长(也曾在拿破仑政府中担任过内政部长)、被誉为“法国的牛顿”的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年)侯爵,授权萨西刊印宋君荣的著作。因为拉普拉斯本人也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



曾出版过《宇宙体系论》(1796年)和《概率分析理论》(1812年)等宇宙天体学的奠基著作。萨西也继承了路易十五至十六时代崇拜中国与东方的三大明星的传统:普瓦弗尔(Pierre Poivre, 1719~1786年)是传教士与企业家,于1740~1747年间曾赴中国、印度和印度支那游览访问,1749年回交趾支那任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将胡椒等香料运往欧洲,法国即以其名 poivre 来命名胡椒;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和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果(Jacques Turgot, 1727~1781年)、国务部长贝尔坦(Henri Bertin, 1720~1792年),与人华耶稣会士们长期保持通讯关系。

萨西正是利用了他本人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推动皇家教授团或教授委员会,于1814年2月11日决定,在法兰西学院设立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的,从而使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课程,被正式纳入到法国最高学府与科研机构中。这在西方,乃至整个中国国外,也算是首开先河。

### 1. 首开中国语言与文学讲座的雷慕沙

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个中国学讲座的正式名称是“汉语和鞑鞑—满洲语语言文学”讲座,该名称一直保持到1918年。时年仅27岁的少帅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77~1832年),成为执掌该讲座教席的第一位法国汉学教授。雷慕沙是在通过一部有关中国医学的博士论文(1813年)之后,才触及汉学的,他也以其有关鞑鞑语言(1811年,《汉文简要》)和汉语文学(1812年)的著作而引人注目。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之后,雷慕沙于1815年1月16日隆重地开课讲演了。他巧妙地掌握了汉语与满语。他有关汉语语法的研究是通过对古文献的诠释而展开的,而他更多的是采用这些古文献的满语版本。因为自从18世纪以来,入华耶稣会士们都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语语法、句法结构更接近西方语言,更容易理解,因而可以通过满文版本来诠释汉文文献。他当时能够依赖的惟一工具书,还是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de Prémare, 1666~1735年)那

部陈旧的《汉语语法札记》[于1728年编写于广州,当时尚为抄本,因为它于1831年才由金斯布鲁克(Kingsborough)在马六甲刻印]。该书惟一的一册收藏于法国皇家图书馆(皇家文库)中,但文库却多次拒绝让他借阅。当他最终获得马若瑟此书之后,才发表其第一部重要著作《汉语语法基本知识》,或者叫作《汉语古文的基本规则》,也叫做《中华帝国通用语言——官话》,即《汉文启蒙》。这是西方研究人员所拥有的第一部真正实用的汉语语法书。1816年,雷慕沙奉命编写《法国皇家图书馆所藏汉文书籍目录》,但他却遗憾地未能最后完成这项工作。其大部分论文均收入了其论文集《亚洲论集》(1825~1829年),其中有一系列对于高地亚洲语言和历史的成果丰富的研究。雷慕沙如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汉学家们一样,也特别关心中国与周边文明的关系,或者是说对这些文明比对中国本身的文明更加关注。他从事了一种被戴密微称为是“流行病式的”或“感染性的”汉学研究,即从中国的近邻开始,逐渐推向远方地研究中国。他的一部远非最重要却是最早的著作,正是《法显撰〈佛国记〉》的译注本,于他死后(1836年)才付梓问世。该译注本荟萃了一批精辟的和内容丰富的考证。如果考虑到其时代、从事研究的工具书之匮乏以及当时西方对佛教知识几乎一无所知的形势,那么这部译著就格外值得称道了。它首次可以使西方人对佛教形成一种较为公正的概念。入华耶稣会士们由于对佛教徒们的蔑视和不理解,曾极力地攻击过佛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有关古代印度乃至整个古代亚洲的历史、地理和汉文资料之丰富性。或许,这就是促使雷慕沙将其精力主要用于对这样一部著作进行深入探讨的原因。19世纪的法国汉学学派,曾有过这样一种倾向:从中国与其他亚洲乃至全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来考虑中国,要发掘有关世界史的汉文资料,而不是为了从其内部研究中国本身。有人曾经指责过这种汉学研究的“表面”观念与肤浅。这种汉学研究的目的是,实际上并不在于专门研究中国,而在于寻找欧洲人自己文明的起源。这就是拉丁学家——汉学家学

派的特征,因为当时欧洲的东方学家,实际上都是拉丁学家。

《佛国记》的译注本是西方对佛教作认真研究的首次尝试,它证明了当时汉学研究的一种非常谨慎的特征,即坚持将中国置于亚洲社会中来研究,而不是作抽象分析。1832年,雷慕沙被在法国流行的瘟疫——霍乱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享年44岁。这个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第一位大汉学家去世了。他开创的汉学事业却日臻发达,人才辈出。

## 2. 脾气古怪而又学识渊博的儒莲

雷慕沙逝世后,其门人斯塔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年)于1832年继承了他的事业,主持同一个讲座。儒莲也一举成为那个时代欧洲最著名的汉学家。儒莲本来也是雷慕沙的出色弟子,但其研究领域却与雷慕沙大相径庭。

儒莲在青年时代,就受到了基础扎实而又多方位的教育。他曾学习过希腊文,以及阿拉伯文、希伯莱文、波斯文和梵文等东方语言。他后来又投在雷慕沙门下学习汉文,雷氏还教他学习过满文。他的最早作品之一,便是借助于满文译本将《孟子》译作拉丁文译本(1824年)。为了谋生,他剽袭了英国新教徒曾要求获得并在马六甲付梓刊印(1831年)的马若瑟神父的《汉语语法札记》稿本。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学中,儒莲放弃了用系统的方法来讲授汉语语法的做法,而是更喜欢诠释文献,以归纳性地从中得出主要的汉语结构准则来。他的著作《根据字词位置来看汉语新句法》(1864~1870年),便是他精益求精和具有敏锐洞察力著作的范例,至今仍有价值。他在翻译领域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继续乃师雷慕沙《佛国记》的译注本,他翻译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853年)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1857~1858年),从而使这两部有关亚洲佛教史的基本著作,能够供西方研究人员利用。这些译著从句法上来看很好,是在没有任何现代参照手段的背景下完成的。他有关梵文词的汉文对音著作《入门》(《方法》1861年),是

在他根本不知道诸如《翻译名义大集》(Mahāyutpatti)那样的梵—汉文辞书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部著作有利于西方学者对佛教文献的翻译工作。儒莲对于玄奘的研究,又导致他研究中国、印度与高地亚洲之间的关系史。他在这方面发表过三卷本的《〈出曜经〉,印度的故事与寓言》(1859年)的译注本,这是译自汉文本的《出曜经》(Avādanas)的译注著作;《突厥史料》,译自汉文《图书集成·边裔典》(1864年)中有关突厥的历代资料;《亚洲地理和中国—印度哲学论集》(1864年)。他同样还关心工业艺术,于1869年出版了《中华帝国的古今工业》,为法国的养蚕业主提供了某些中文著作的译本。儒莲还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瓷器制造术的著作《中国瓷器的历史与制造》(1856年),使殷弘绪(François - Xavier d'Entrecolles, 1662 ~ 1741年)于一个世纪之前提供的有关中国瓷器的知识面目一新。他的这些资料都是供当时正在法国制造瓷器的塞夫勒(Sèvres)作坊的工匠们使用的。此书实际上是《景德镇陶录》的译注本。

儒莲对于中国俗文学著作颇感兴趣。在他那个时代,俗文学甚至被中国的学术文化界鄙视。但它们对于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儒莲不仅完整地重新翻译了《赵氏孤儿》(1834年),而且还附了全部曲子。这部曾由马若瑟神父提供过不完整节译本的元曲,启发伏尔泰写成了一部讽刺悲剧《中国孤儿》。他还翻译了另外两部元曲:《灰阑记》(1832年),它启发了较晚期的剧作家,如德国剧作家和戏剧改革家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 1898 ~ 1956年);儒莲的所有译著中最享有盛誉的,则是《西厢记》的译本(于译者死后才出版,1872 ~ 1880年)。儒莲还致力于翻译一批具有公式化大团圆结局的短篇小说,而对这些小说的选择是令人无法解释的:《白蛇精记》(1834年)、《平山冷燕》(1860年)、《玉娇梨》[《金瓶梅》续本(1864年)],另外还有许多文集的节本。

这些爱情小说在中国令人喜闻乐见,它们在中国于某一时期

也被收入《十才子书》的文集中了。儒莲之所以选择这些书,可能是由于他在传教士们寄回法国的书籍中发现了它们。儒莲坚持研究话本作品,此类作品向法国公众揭示了某些为欧洲人无法亲眼目睹的风尚。这至少是儒莲在《平山冷燕》译本前言中所指出的情况。这也许是儒莲(也包括同时代的其他汉学家)对中国小说和戏剧所产生的兴趣,首先是由于这些体裁比经典或诗歌更符合欧洲人的趣味。

儒莲是19世纪中叶无可争议的欧洲汉学大师。他那令人讨厌的性格就如同其无可指责的学问一样闻名于世。他嫉妒、暴躁、易怒,大权独揽,排斥一切竞争对手。儒莲任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长时期掌握学院行政权(1854~1873年),另外还兼任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和国立图书馆副馆长,如此多的兼职在法国行政职务中也是不正常的。他与所有敢于批评他的人之间的争执纠纷,始终都具有传奇色彩。纪尧姆·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是一位平庸的汉学家,曾与儒莲同在雷慕沙门下为同窗学友,后来却成了他的嘲笑对象。然而,在《对最新一篇诽谤短文中令人厌恶地歪曲了一项体面事业的简述》(1842年)中,鲍狄埃遭到了沉重打击,《被迫答复隐藏在幕后的所谓正义朋友》则是向其他人叙述此事的。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标题,证明了法国汉学界的风气。自从礼仪之争以及18世纪弗雷烈与傅尔蒙之间那场惊心动魄的论战以来,大辩论始终未见缓和。

法国汉学界对儒莲的学问与性格的评论基本是一致的,人们都尊重其学问,而憎恶其作风与性格。

法国著名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年)于1894年在《通报》中发表《汉学研究(1891~1894年)》时,对儒莲作出了一种当时法国汉学界普遍接受的评价:“斯塔尼斯拉斯·儒莲……未能留下像人们怀念其师雷慕沙那样令人深表钦佩的记忆。他当然是一名大学者,但他的个人缺点(我敢说这是他身上天生的某种嫉妒情感),给法国汉学造成的灾难,也只能由他投向汉学研究上

的光芒来勉强遮掩……儒莲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在巴赞(Bazin)和毕欧(Biot)逝世后,经过40年的施教,却很少培养出准备为本学科的发展或增加汉学家数量而奋斗的人……儒莲的事业确实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业……尽管这一切使他个人和我们国家无上光荣,但没有人认为儒莲是一个充满道义责任的教授,他未能于其学生中培养能继承或革新其传统的接班人。一名大师不应将其学生视为竞争对手,而是要作为继承人。儒莲的人格没有其学问那样高大”。

当主持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汉语讲座的安东尼·巴赞(Antoine Bazin, 1799 ~ 1862年)于1862年12月30日逝世后,儒莲为了阻止他不喜欢的人来继承这个讲座的教席,竟然亲自兼职主持该讲座长达六年,而他本来是无权这样做的。由此也可以窥见其人品之一斑了。

### 3. 资格受人质疑的德理文

当儒莲于1873年逝世后,1874年继承他在法兰西学院“汉语和鞑鞑—满语语言文学”讲座的,是他的学生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is, 1823 ~ 1892年)侯爵。他是一个平易近人和细心的文人。但其名望远不及其先师们那样名彪青史了。

德理文是法兰西学院教授,曾任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长,获法国荣誉骑士等。他头衔多得吓人,但在历史上却是一个不为人熟悉的人。德理文是欧洲最早关心中国诗歌的汉学家之一。因为在先前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诗歌只是一些毫无生气的文字符号,入华耶稣会士们也完全忽略了这门学问。德理文的《唐诗》(1863年)是一部唐诗选,前面附有他对于汉文诗词韵律技巧的论述。他翻译的《离骚》译本(1870年)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使用了一种略显松散的语言,但它却在法兰西第二帝国贵夫人们的沙龙中颇为时髦。他将《今古奇观》中的11个故事译作法文。德理文还根据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有关东裔与南裔民族的两部

分内容,编译了一部巨著《中国藩部民族志》(1867~1883年)。

德理文实际上是通过一部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著作留名于世的。后世很少有人记得他是一位大汉学家,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发展了“可操纵梦”的理论。他每天清晨都会把自己夜间所作的梦记录下来,这就是他采取半匿名形式而出版的《梦与操纵梦的手段》(1867年),故许多人把他视为“精神分析法”的先驱。弗洛伊德(Freud)于其《梦的释义》(1899年版)中,也曾多次提到过德理文。所以,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并非是德理文真正喜欢的职业。他的汉学家资格也颇令人质疑,尽管他一生中获得过属于“汉学家”的众多荣誉,但是,在法国人的心目中,他更应该是弗洛伊德的先驱。

德理文是于1858年开始接触汉语与汉学的。其生父于该年6月4日、其养父于同年11月16日先后去世,他接受了一大笔遗产,从而可以衣食无忧地从事“汉学”这类高雅而又清贫的工作。其实,他于1850年就写过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次年又与人合作,最终完成了毕欧(Edouard Biot,1803~1850年)未曾杀青的有关《周礼》译注本的遗作;他于1849年由安东尼·巴赞介绍加入了法国亚细亚学会。但他在汉学领域并没有多少名气,甚至连1872年和1883年先后出版的《东方现代语言专门学院的历史》中,都不见其名列于教授名榜中。但于1869年,法国公共教育部正式批准了他在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职位,这是为了取代儒莲在该院的教席。

在儒莲晚年身体不佳的情况下,德理文于1872~1873年间,曾代替儒莲主持过法兰西学院的汉语和汉学课程,这是由公共教育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联合决定的。儒莲于1873年逝世后,德理文在1874年6月1日被正式任命执掌该教席之前,实际上已把该教席控制在自己手中了。他是由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与法兰西学院教授委员会共同提名的惟一候选人。但这项任务也招致了许多反对意见。觊觎该职位的保尔·伯尔尼(Paul Perny)神父到处散发传单,攻击德理文不称职,声称“德理文侯爵绝对无能力讲汉

语,更不能用汉文书写六行文字或翻译汉文著述”。因为《离骚》并非是由德氏自汉文原文翻译的,而是转译自德文版,而且还使用“捉刀人”——中国助教李少白。

德理文在法兰西学院授课的一大部分内容,是解释摘引自《今古奇观》中的民间故事。这些课程后来形成了上文提到的其译注本中的内容。

1876年,德理文荣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儒莲奖,这主要应归功于上文提到的他对马端临《文献通考》部分章节的译注。从此之后,德理文在历届儒莲奖的颁发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1878年2月8日,德理文当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院士,这是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也是他经过了三次竞争之后才获得成功的。1887年,他当选为该科学院的副院长,并于次年升为院长。在此前后,他在该科学院的讲坛上作了许多报告。如1870年,介绍《离骚》;1872年5月,介绍了汉文方块字的历史与特征;1872年5月,介绍了台湾与琉球岛的历史;1872年12月~1873年1月,报告了中国南方的民族史;1878年5月,介绍了一方中国玉玺;1879年2月,又介绍了中国的“藩部”历史;1885年,作了“有关安南词汇与安南人的真正价值”的报告;1886年3月,报告了儒家教义。这些报告大都发表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文集中。

德理文有关中国的著作还有很多。他编译自《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的《授时通考》的《中国人的农业与园艺术研究,可以有益地引入西欧与北非的中国植物、动物和农技》(1850年);《面对欧洲的中国》,叙述了1858~1860年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远征(1859年);他于同期还计划翻译《金瓶梅》(但未果)、《中华文字全本》(1869年)、《中国玉的历史》(编译自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苗子民族志》[国际东方学代表大会中国组的报告(1873年)]。

德理文于1892年11月2日逝世。根据家属愿望,葬礼从简,安葬于豪巴纳斯公墓。



#### 4. 新风格的汉学大师沙畹

德理文于 1892 年去世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 ~ 1918 年)于 1893 年继任了其教席。沙畹的继任,开创了法兰西学院一代新型汉学家的先河。过去那些主持该讲座的汉学家们,都不曾有机会来华作实地考察或与中国学术界广泛接触,他们大都只会读汉字,而无法流畅地讲汉语。沙畹是第一个曾长期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从事过多次长时间学术考察和考古探险的人。他广交中国学术界朋友,不仅精通中国古汉语,而且也能用现代汉语表述。自他之后的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和魏丕信,基本都是这样做的。当然,他们的口语能力始终并不理想,这只能勉为其难了。总之,正是从沙畹这一代人起,巴黎才被誉为西方的“汉学之都”。从此之后,“学汉学,到法国”的说法广泛流传于欧陆。

沙畹如其同时代法兰西学院的前辈儒莲一样,很快就被整个西方汉学界公认为汉学研究大师。他一生中可谓著作等身,不但涉及面很广,而且其中许多著作在西方是开创性的著作,主要是史学家的著作,但也拓展到了其他领域。所有这些著作都注重一种新方法,他考虑到了自儒莲以来所有史学和文献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故必须使汉学革新。

沙畹出生于一个新教徒家庭。在宗教战争期间,他自瑞士移居法国,属于法兰西学院的一批“汝拉山区”教授的世系。因为沙畹出生在瑞士汝拉山区的人,从小就有一种苛刻的和一直发展到谨小慎微的职业道德。他接受了人们在法国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学府的培养,这就是法国政治家的摇篮巴黎高等师范大学的教育。当时巴黎高师校长是一位古代艺术史学家,他将沙畹的研究引向了中国的方向。当时法国最时髦的是唯科学主义和唯历史主义。因此,沙畹或多或少地总要受 19 世纪末期思想的驱动,在青年时代,他正是由这些思想哺育起来的。

沙畹的研究生涯始于哲学,他于 1891 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便是与杰出的日耳曼学家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合著的一